

民初川边治理及其成效

黄 天 华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民初北京政府根据川藏边情的演变,先后设置了川边经略使、川边镇守使、西康屯垦使等地方长官,并划设川边地区为特别区域,以此来加强对川边的治理。川边地方当局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川边地区一直处于动荡的局面、北京政权式微、四川时局持续混乱等因素的影响,民初川边地区治理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以致人心浮动。

关键词:民国初期;川边特别行政区;尹昌衡;川边经略使;川边镇守使;西康屯垦使

中图分类号:D693.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3-0168-07

1906 年,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为西康建省奠定了基础。然而,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已不能有效控制康藏地区,清政府派的驻藏大臣和川军,以及北京政府任命的驻藏办事长官,都被迫离开了西藏。民初还发生了两次大的康藏纠纷和多次小的康藏冲突,使得川边地区基本上处于动荡的局面,而且管辖范围也缩小了很多,西康建省事宜因此停顿。如今,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近代康区史以及康藏交涉史,有必要认真地梳理民初川边治理的实际情形。

一 尹昌衡西征与川边经略使的设立

辛亥革命之际,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唆使下,策动西藏各地掀起“反汉”暴动,他发布命令称:“自是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要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1]240}同时,因为此前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镇压保路运

动风潮,急调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焘率边军回成都救援,使得川边驻防空虚,一些不服改流的土司乃乘机复辟,并配合内犯的藏军。结果,藏军相继进占察木多(即昌都)、江卡、乡城、稻城、里塘等川边地区。

为了抵制藏军的进攻,四川都督尹昌衡于 1912 年初设立筹边处,并任吴嘉谟为炉边宣慰使,“出关安抚一切”。筹边处随后呈请尹昌衡速派重兵增援,其言曰:“有西藏则四川存,无西藏则四川亡;四川存则中国安,四川亡则中国危。……抑尤有陈者:边藏地大物博,国人称之为黄金世界,实我川肘腋间之宝藏。当此生齿日繁,民不聊生之际,若能保全兹土,尚可以实行殖民政策,消纳游民。否则生计愈穷,无所安置,川乱亦将永无救平之望。”^{[2]37-38}其时,云南都督蔡锷、重庆总司令熊克武也先后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发兵救藏。尹、蔡诸人向国务院指陈:“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危。民国初基,强邻环伺,

收稿日期:2011-02-26

基金项目:教育部 2010 年度青年基金课题“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地区为考察中心(1906—1955)”(编号:10YJC770033)以及四川省教育厅 2008 年度重点课题“国家整合与边疆政治: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编号:08SA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天华(1977—),男,四川盐亭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川康地方史。

莽[蜀]之藏卫,即脱范围,内何以辑抚他族,外何以应付列强”,“民国建设伊始,若令藏境一有叛离,势必牵动全局”。但国务院认为民国未定,筹款困难,不能用兵西藏,“俟大局粗定,再集合群力经营西藏”^{[3]7,11,4}。5月10日,国务院电令钟颖接替联豫,出任北京政府驻西藏办事长官,主持藏政。但西藏局势仍继续恶化,不久之后钟颖也被迫离藏。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4日任命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征藏总司令,率军西征。

川军于9月3日攻克理塘,16日抵昌都,并很快克复昌都、类乌齐等地,并有继续入藏态势。此时,英国驻北京公使却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硬照会,要求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不得将西藏改设行省,不得派无限制之军队驻扎西藏各处,如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三个条件,英国政府就拒绝承认中华民国。“如果民国政府定欲征藏,继续派遣征西军前进”,英国则将“以实力助藏独立”^{[1]248}。北京政府在英国的威胁之下,不得不命令川军停止入藏。国务院致电尹昌衡说:“边兵入藏各节,关系甚大。……前年正月英馆致外务部文称,西藏出扰乱治安之事,英国不能不问。本年英使因传闻调派军队征藏,迭次声明,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和商,易为归结,倘现用武力,与友睦必有巨碍,酿出重大交涉,或直至冲突等等语。”“我派兵入藏,恐致不可收拾,一虑英人派兵,届时与战,则全国摇动,退则见侮于藏番。我不派兵则前此条约俱在,将来事定申明照办,我应享利权等暨巡警法律诸端,在条约者,尚可规复。藏番本弱,取之甚易,若我不派兵,英人尚无可借口,否则英兵入占据,即无办法,不如留作后图。能先复川边,藏中震慑,届时呈拟办法,候再与英使切确商论,当易结束,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3]31-32}随后,尹昌衡停止入藏,积极经营川边。

在尹昌衡奉命西征的同时,云南都督蔡锷也奉命派滇军助剿,蔡氏随即任命云南军政府参谋厅长殷承瓏为滇军西征军司令。1912年7月,滇军自昆明出发,于8月26日攻克盐井、乡城。随后,川、滇两军为争夺川边地区的管辖权而发生了争执。其实,争执的远因在于辛亥革命之际滇军“援川”时,曾占领自流井、贡井地区,控制了四川的财源之区,引起了川人和川军的恶感,使得川人对滇军入川大都不信任、不欢迎。尹昌衡即在西征途中数次发出电报,阻止滇军前进,意在独据川边。他指出“藏人抵

抗力弱”,川军能独立承担,如果滇军占领巴塘等处,反而使“川军右臂全断,边藏用兵,无从联络”;即使滇军要征藏,也须归他指挥。同时,他对滇军“直取”川边产盐之地盐井县也提出了抗议^{[3]33,48,85}。对此,蔡锷则予以力争,要求北京政府划清川滇用兵区域,“以宁静山东之巴里两塘及川边一带归川经营;惟山南之盐井地方距阿墩子四站,为滇边门户,实我军入藏必由之要路,其山西之江卡、波密、杂(瑜)等处,与滇边相近,向不属川者,均归滇军抚剿”。并迭电要求将盐井划归滇军管辖^{[3]54,65}。

北京政府为了防止两军“逼处”,引发纠纷,于9月21日下令:“川边抚剿,尹督自任专办,筹兵筹饷,悉由该督经营,滇自不必争。刻下昌都等处均驻川兵,殷司令切勿轻进,转生枝节。”^{[3]83}蔡锷随即电令殷承瓏撤军。1912年11月,滇军返抵丽江。

大约同时,对于尹昌衡的名分和权限等问题,北京政府也正积极筹议。1912年8月,代理四川都督胡景伊提请任命尹昌衡为“边藏宣慰使”,北京政府鉴于“藏事须与英人交涉办妥,方能宣布,此时尚多窒碍”,不予同意,却有意仿伊犁镇边使之例,授尹昌衡以川西镇边使,“节制川边文武以下职权区域,皆如川滇边务大臣之旧,庶可专一事权,整顿地方”。稍后,尹昌衡提出在昌都组织“边藏镇抚府”,以为边地建设的总领机关,北京政府又予以否决,并于9月26日任命尹昌衡为川边镇抚使,归四川都督节制。

然而,尹氏对此仍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川边名称,对内固为适宜,对外则有利弊,盖边藏界址,素难明晰,南北两路,幅员尤宽,非趁此次经营,则他人反可借口川边二字,蹙我范围,一经失败,不可收拾。查边藏皆在炉关以西,不如定名为关西镇抚府,目前字义浑含,外人莫由干涉,将来努力充足,凡事便于扩张”。他有意置前军司令于昌都,待机西进,“以避入藏之名,而成制藏之实”^{[3]78,94}。北京政府再次予以否决。也就是说,尹昌衡总是想保留平定西藏的余地和机会,北京政府却只想把实力经营范围暂时限定在川边地区,以免引发外交纠纷。由于其志未能得遂,尹昌衡随即要求回任四川都督,由胡景伊继任川边镇抚使。北京政府仍然不同意,且严令尹昌衡“暂时以川边为限,毋得轻进,免生枝节”。1913年6月13日任命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直接受制于中央,7月3日又任命尹昌衡兼领川边都督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涉及到尹昌衡和胡景伊

的争权夺利。胡景伊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于是原任四川都督尹昌衡被任命为川边经略使和川边都督时,代理四川都督胡景伊却得以实授。当时就有舆论批评北京政府未能明确川边都督和四川都督之权限划分:“四川二字,包括四川全省在内,川边都督与四川都督之权限,当如何划清乎?川边都督所谓边者,具何意义乎?或谓川边即川省之邻藏者,然则川边经略使不能独尽其职权,而必冠以都督之名词乎!以川边经略使而兼领川边都督事,川边经略使与川边都督之职权,其区别固有在乎?是皆百思不得其解者也。”^{[2]62}

尹昌衡在川边时,改定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和代理清末川滇边务大臣傅嵩林所置各县、设治局为府州县。其中,有康定府、巴安府、理化府、邓柯府、昌都府、太昌府,甘孜直隶州、德化直隶州、白玉知州,泸定、雅江、定乡、稻城、盐井、得荣、义敦、道孚、炉霍、怀柔、武城、贡县、同普、察雅、石渠各县,并规划有太昭一府,嘉黎、硕督两县。有意思的是,据孙震回忆说,尹昌衡还对川边地区的地名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西康之‘昌都’(原名察木多),‘硕督’(原名率般多),‘太昭’(原名江达)各县,均因尹氏名昌衡号硕权字太昭而定名”^{[4]30-31}。

尹昌衡委定了县州府官,从事整理建设;裁撤了兵站部,设采运局,负责供给全边军械军需;设军务处,下设参谋局、军械局、总务局、军需局、军法局五局;设政务处,下设民政司、教育司、实业司、财政司四司;设边东、边西两道,以颜鐔为边东观察使,王鉴清为边西观察使,王氏后又被任命为办理西藏交涉副使^{[5]205}。

1913年11月1日,尹昌衡因病请假,川边都督由边东观察使颜鐔护理;8日,北京政府准给尹昌衡三月病假。1914年1月3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川边经略使兼都督事,“尹昌衡留京另候任用”。2月2日,尹昌衡在北京被拘禁。尹昌衡经边时间虽然不长,却制止了藏军的东进,而且基本上恢复了赵尔丰时期的经营规模,一度稳定了康藏格局,对后来的中英西藏交涉以及川边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川边镇守使与西康屯垦使的设立

1914年1月,北京政府任命张毅为川边镇守使,归四川都督节制。张毅上任后,在镇守使署内设第一科和第二科,分别主办内务、司法、教育、财政、实业、交通等;增设杂税整理处,推行新税如验契税、

屠宰、印花、酒税等;改定乌拉支应章程、征收支拨粮税章程,并准备成立川边官银行,以调剂金融;对于桥梁、道路、军事邮递等都所有整修,恢复了各县官话学堂;拟定垦务扩充计划,所有招垦夫、置农具、给耕牛种籽各项,皆有详细算计;巴安印刷、制革两厂也责成县知事兼管,并将其开支列为川边常规预算。为紧缩地方政府经费,将各县定为三等,一等县经费700元,二等600元,三等500元,设治局360元;并将原有边军11营分为三统,以北路督战官刘瑞麟为全军统领驻巴塘,刘赞廷为分统驻宁静,彭日升为帮统驻昌都。

在北京政府应付西姆拉会议的过程中,川边镇守使多次与外交部会商川边和西藏的界址,发挥了积极作用。外交部明确指出:“西藏议约,界务棘手,非有确证,难资争辩。前边务大臣(赵尔丰)曾将巴塘、理塘、德格、东科、章谷、瞻对、乍丫、察木多等处次第改流;并将罗科、俄洛、色达、三岩、波密等处收服;又收服前赏达赖之江卡、贡觉、桑昂、杂俞、类乌齐、硕板多、洛隆宗、边坝等地。”外交部要求川边镇守使将相关“全案卷宗,并将投诚原结拍照送部。至我军在会议前兵力范围所及,极西抵于何处,驻兵地点有几,又察木多处有无教堂”等,统统查明电复。张毅回电称:“至边军极西驻扎地点一层,在前清时,边军本进驻江达。反正之初,秩序紊乱,逆匪乘隙骚扰,嗣派兵填防,甫至察木多属之瓦合寨,及三十九族之葱坡坝两处,适奉电阻勿前进,不特我军未及藏界,即川边固有之地亦未收复。”他认为,西藏“一脱我之羁绊,即入英之范围。此际如许藏人多占一分地土,不特川边损失一分领土,且将多受一分侵害。即就地而论,江达本属天堑,为察木多门户,苟非我有,则察地以西,无险可扼,防守特难”,因此,“无论江达非复边有,即察木多一带,亦在要索之列”^{[6]14-15}。这对中国在与英国的谈判过程中坚持自己的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914年夏,北京政府将川边地区改设为川边特别行政区,归川边镇守使管辖,并裁撤尹昌衡所设之边东、边西两道。国务院和内务部在给总统的呈文中说:“川边地方,介处蜀滇之间,原为前清川滇边务大臣辖境。嗣后改土归流,各县次第成立,业经前川边经略使呈报,经由本部据情呈明在案。是川边与川省划疆分治,习惯既久,因沿袭便。稽其辖地,东障四川,西控卫藏,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山脉纵横,

形势扼塞，匪独川滇之辅车，实为西南之屏藩。为巩固边防计，自非独成一区不足以便措施，而期完密。”稍后国务院即决议将川边地区改为川边特别区域，其言曰：“川边毗连藏地，现实际藏事未定，关系紧要，自应仍循清末旧制，将川边之康定等县划为特别区域，归川边镇守使管辖，以专责成。”^{[6]17}

同年9月，川边发生了陈步三事件。当时，驻乡城旅长稽廉以营长陈步三违令轻进贡嘎岭，撤其营长职务。陈步三却借口稽廉克扣军粮，率部杀稽廉及旅部人员19人，并进占雅江，焚毁新建的河口钢桥，进逼川边重镇康定。镇守使张毅因无兵可调，仓惶逃跑，城中居民纷纷避往乡间。陈步三入城后大肆劫掠，然后逃往四川，不久在乐山被捕法办。因张毅在这次事件中有失职守，袁世凯遂将其撤职。

1915年5月，刘锐恒被任命为川边镇守使，同时张毅被任命为川边财政分厅厅长，分厅设于康定，与镇守使署平级。10月，北京政府改委李宝楚为川边财政分厅厅长，张毅交卸回川。1916年2月，北京政府又委李宝楚兼任川边道道尹。刘锐恒任职期间，各项事务多依旧规，并没有什么新的开拓。8月，川边再一次发生兵变，驻康定边军第十一营营长傅青云索饷哗变，劫掠全城，财政分厅保存的四川协济的现金及美丰银行的钞票亦全数被劫。傅青云后被陈遐龄团长率军击溃，刘锐恒则因此次兵变被撤职。时适滇军入据川省，滇人殷承瓏遂被任命为川边镇守使。

1916年秋，殷承瓏接任后，请准熊廷权为川边道尹兼川边财政厅长，且归镇守使管辖，“自是而全边治权，乃定于一尊矣”。殷氏依据张毅所定知事奖励学行章程，将全边各县知事，加以考核，量才更调；依据征收考成单行章程，饬财政分厅将各县之征收田赋成绩，一律加以考核，并将各县课员，连带考核；又呈准中央将炉关划归川边直接监督，使常、茶两税成为川边直接收入，将川边解部之直接新税截留，作为财政部协济之款。

1917年，川中滇军为川军击败，周道刚继任川督，殷承瓏被撤职，北京政府另委熊克武为川边镇守使。因熊氏未赴任，北京政府于10月16日电令陈遐龄护理川边镇守使。1918年2月2日，陈遐龄获实授；7月，康明良被任命为川边道道尹，陈启图被任命为川边财政厅厅长。就在陈遐龄接任川边镇守使前后，川边地区发生了“第二次康藏纠纷”^①。这

次纠纷使得藏军的实际控制线向东推进到金沙江流域，而边军所能控制的地区仅剩康定、泸定、雅江、炉霍、甘孜、瞻化、巴安、盐井、得荣、定乡、稻城、理化、道孚、丹巴、九龙十五县^②。

此时，四川局势也非常混乱。川、滇、黔军正为争夺四川地盘展开混战，边军也卷入其中。陈遐龄在给北京政府的报告中即说，1917年7月第二次康藏纠纷爆发时，“适川滇交恶”，彭日升“抽调所部各营，纷纷大举入炉，攻击殷使（即殷承瓏一引者注），国防为之一空，藏番野心因此愈炽”^{③[7]90}。熊克武掌控成都之后，又实施防区制，使得四川各军为了争夺地盘又持续展开争夺战，却忽视了对藏军的防范。据记载：“在熊克武任督军后，对藏军历次东犯围攻打箭炉，因熊氏限于所制定之四川防区制形势，瓜分已定，无力派出援军及财力顾及边防，只承北政府命派员与英藏口头交涉，陈氏孤立川边，先后迭受藏军挫败。”^{[4]99}1923年，四川内战又起，陈遐龄从他所部各旅中挑选精锐，由他亲自率领入川参战，意图分得一杯羹，却在新都石板滩一战，被四川军阀刘成勋打败，损失惨重，溃不成军。陈到北京求援未果，遂留在北京当寓公。

当时的全国局势更是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北京政府也无暇顾及川边。1918年2月，川边战事已转趋激烈，藏军节节进逼，但北京政府却茫然不知，经英使朱尔典提出后，才于2月27日致电四川督军查明战情^④。据载，在同年3月，陈遐龄先后拍了三四十通电报向中央求援，都无结果^⑤。在这种情况下，陈遐龄不可能在川边治理上取得多大的成绩。论者称：“陈使守边八年，于边政无一可纪之成绩。”^{[5]216}

1925年春，陈遐龄被北京执政府撤职，刘成勋被任命为西康屯垦使，并将川边特别行政区改设为西康特别行政区。刘成勋长驻雅安，在康定置屯垦使行署，以孙涵驻康定管理边事，韩光钧为川边道尹，分管民政；又废川边道，改设康东道（驻理化）、康北道（驻甘孜）；设政务厅，任陈启图为厅长，设实业厅，任孙式兰为厅长，设财政厅，任谭励陶为厅长；又设立康定初级师范学校和西康陆军军官学校，近代出身康区的著名人物格桑泽仁即毕业于西康陆军军官学校；又设成康马路局，筹备修筑成都到康定的马路。惟限于经费，所有各种计划，仅能粗具规模，收效甚微。1926年6月7日，吴佩孚免去刘成勋的西康屯垦使职务，任命刘文辉继任。12月，刘成勋、刘

文辉相继宣布易帜,脱离北京政府,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四军军长。1927年夏,刘成勋被刘文辉击败下野,刘文辉正式接管西康。

三 余论:民初川边治理成效未著之成因及影响

北京政府根据川藏边情的演变,先后设置了川边经略使、川边镇守使、西康屯垦使等地方长官,并划设川边地区为特别区域,以此来加强对川边地区的治理。川边地方当局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的说来,民初川边地区的治理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其中的原因甚多,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川边地区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民初川边除了爆发第一、二次康藏纠纷外,还有很多小冲突,使得康藏双方一直处于紧张对峙状态。1914年3月,调查员周文藻就向北京政府报称:“藏匪□集下噶茹、桑多打堆各处,迫胁百姓,帮兵彭统领分兵防堵,战事甚烈,伤亡颇多,昌都地面广阔,仅有四营兵力,过少。桑昂、杂瑜尚未收复,匪可袭我军后路。”^{[7]85} 1920年3月22日前后,“藏番满拉,又率兵五千,进攻川边,占领(类)乌齐、德格等十一县”;1921年5月16日,“川边藏番,近分两路内犯,一由泥马宗趋雅江,一由康定属之甲埂坝直趋康定”;1922年3月28日,“经陈遐龄连日攻击,(藏番)近始不支,向藏边退却”^{[2]248,273,279}。

其次是民初缺乏有力的中央政府。陈启图就指出:“民九以后,北平徒拥中央政府之名,而威权日替,国帑日绌,自身且不能保,政令不出国门,何能远及于荒寒之川边?”他又说:“民元以来,恒以当国者之关系,而定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关系深则事业宏,关系浅则接济薄,一切国计防务,率皆论人不论事,此固国人所公认者。陈使(即陈遐龄一引者注)既无党系,又无奥援,徒以向北之故,为当国者所默许,民国七年,段合肥(段祺瑞一辑者注)当国,其时正筹西北大计,有此两因,故陈之代表请求,尚能有相当之接济。其后靳翼青(靳云鹏一辑者注)筹统一,陈使与川中附北一系,尚有联络,故所请之械款,亦获得数度之发给。迨合肥再度入京执政,陈以附吴之故,合肥遂撤其镇守使之职”。1920年前后,北京政府本来准备接济川边一批军火,旋因“直皖之战事发生,北京政局大变,政府不能顾及边事,陆部军储库,悉被直奉两军分取一空,而已允川边之械弹,亦无法

领取”,“而此后边藏大事,中央亦无力兼顾矣”。1921年春,北京政府落实“济边款械”,“而川局忽变自治,大为统一障碍。陈使第二次恢复失地计划,亦受影响。中央威信扫地,此后自救不暇,又焉能及于边陲”^{[5]218,228-230}。

再次是四川政局的持续混乱。据载,从1912年到1935年,四川发生的内战“共有四百七十八次。平均来算,每月应该有两战”^{[8]579}。军阀内战如此频繁,使得四川几乎不可能对川边地区有实际的支持,不仅军阀们大都把目光集中于四川内地,未曾充分重视边藏问题,而且川边地区各主政者也不时卷入川战漩涡,使得边备空虚,治边无人,吏治废弛。有论者指出:“陈遐龄在位十三年,居康定者十之三四,居雅州者十之六七。垂涎百尺于四川之地盘,而弃关外各县如敝屣”。刘成勋“虽受命为西康屯垦使,实未尝出雅州一步。雅州距康定又五百余里,于是乡(城)稻(城)四县,完全脱离西康政府之管束”^{[9]69}。从尹昌衡、殷承瓚、陈遐龄、刘成勋等人的上任、离任,在在都可看出四川局势演变对川边的连带影响。而四川与川边不能协调一致,就导致川边缺乏稳固的后援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民初川边治理不力深刻影响了川边的民心向背。由于历任川边镇守使的放任,“关外诸将士纵兵虐民。地方牧令,更猥杂无伦,市侩其行,恣意蹂躏,边民无所控诉。藏人遂得乘隙要结,嗾其背叛,历年溃兵军械,又大半为蛮人所得,益有所恃,故一经开衅,汉兵靡不失利,盖由主客之形既判,众寡之势又殊,遂至屡战屡蹶也”;加之当时驻军战斗力很弱,不能很好地镇慑地方,造成的后果就是边民十分怨恨汉官驻军,“职是之故,藏兵一到,相率望风投降,驱逐汉官驻军,实非有爱于藏方也”^{[5]217}。刘禹九也指出边军的“放纵无度”使得川边民众滋生“叛意”,其言曰:“兵卒日寻蛮民而鱼肉,小有事故,辄诬为反叛,勒兵剿洗,盖利其财也。喇嘛寺尤为人人注目之所,察木多、咋雅、烟袋塘各寺,均为呼图克图坐禅地,辉煌庄严,即建筑工程,每处亦不下数十万金,其储藏尚不在内,均为彭、刘等军毁于一炬,大掠其所藏,而以剿叛报功,反得晋崇职、给勋章。蛮民由是痛恨边军,始真有叛意矣。”^{[10]172}当然,也有部分民众自愿归汉官管辖。以前属“藏番管辖”的莫东、董日两村头人即于1916年9月向同普县知事呈报愿意归附:“前赵大臣(即赵尔丰一引者注)抵边,

各属改流设治,而头人等地方偏居一隅,竟置化外。头人等屡欲输诚内附,虚愿莫偿。今值知事大人来同,仁风善政,遐迩咸钦,百姓等特具结前来委托头人代达,甘愿归同普管辖,完粮纳税,支应差使,伏乞俯纳,俾头人等两村人民得托庇宇下,有所依归,则感激无暨矣。”^{[6]20}

另一方面,民初川边的社会情形为我们观察近代中国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在这块曾经被内地人视为蛮夷、落后的地方,在民初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很文明了。曾任道孚县知事的朱增鋈就发现康藏人的“天足”正是“文明”的表现,其婚姻也甚是自由,他感叹道:“自由结婚,西欧文明,不图潮流,远输边地。”他曾“讯夫妇各请离婚一案,询厥底里,供称婚嫁未久,例应各寻新交,予遵西例,笑而允之”^①[11]112-163。朱增鋈还发现道孚县的天主堂,“设堂多年,服从者皆汉民。近有投福音教者,多叛民罪犯,藉以作遁逃藪”;朱的继任者吕国璋又记载说:“(道孚县觉罗村)人民,全系天主教民,种虽汉族,语言、服色,相去夷民不远。传集该村头人各户,劝导设学。始悉已有一堂,乃为谭教士收拾人心之计,延一形同聋聩六十余岁老叟,类如内地祠庙看司,模模

糊糊,教读耶稣圣书,误我青年,痛心疾首。知事谕令当筹改立一校,藉授初等小学教科。该村头人等,僉谓司铎恐将不允等语。知事一聆此语,耿耿在心,障碍教育,已属不小,而丧失主权,羞忿何极。乃与谭教士再三蹉议,明言以该教民等,能读圣书,要必多识汉文汉字。交涉结果,乃得赞同另立学校。”^{[12]173}这里所反映出的历史现象甚是值得注意和深思,川边地区信天主教、基督新教的都是汉人,而信仰佛教的藏民是抵制和反对基督教的,那么,近代天主教、基督教传入康藏地区之后,和藏传佛教产生了哪些冲突?又如何慢慢在川边地区立足的?县知事要在当地设一学校,居然还要与谭教士“再三蹉议”,方才得其赞同。而且,当地的头人居然都认为谭教士不会答允另设学校,他们究竟是“怕”谭教士及其背后的势力,还是真的认为谭教士比县知事更有权力决定当地的事情,或者只是借谭教士的名义来反对汉官、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呢?而县知事恰恰在这里发觉了“主权”的丧失以及收回主权之不易。这些都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也说明近代中国还有很多边缘的、微观的、底层的面相值得探索。

(本文曾提交2011年10月于成都举行的“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讨会”,承评论人周斌老师提出批评指正意见,谨此致谢!)

注释:

- ①关于第二次康藏纠纷及其对川边局势的影响,详见黄天华《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
- ②刘赞廷说:“计此次(纠纷)失去地方为恩达、昌都、察雅、贡县、同普、德格、邓柯、石渠、白玉、宁静、科麦、察隅,共十二县,所存者为巴安、武城、盐井、义敦、得荣、定乡、理化、稻城、雅江、九龙、盐边、盐源、瞻化、甘孜、炉霍、道孚、丹巴、康定、泸定十九县。”刘赞廷《三十年游藏记》,收入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二十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 ③巴塘边军分统刘赞廷却反控陈退龄而非彭日升抽调边军入川参与川、滇军阀混战,彭日升降藏是情势所迫:“开战数月,士卒枵腹,镇守使陈退龄不惟无斗米寸械之接济,一兵一卒之应援,反抽调甘孜、德格、同普各战线之军,入关作战,……藏番值我内地空虚,乘机四起,……以致德格、邓柯、石渠等县,以次丧失。”详见刘赞廷《边藏杂言》,收入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十四册,第134-135页。
- ④《民国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四川督军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西藏议约案》第六函第二十六册。转引自: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6年版,第373页。
- ⑤据《西藏议约案》第六函第二十六册收录的电报所做的统计。转引自: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第366页。
- ⑥1929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员黎光明等人也在川西北松潘等地观察到了很多与通常认知截然异趣的现象,值得参照比对。详见黎光明、王元辉著《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王明珂编校、导读,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4年版;王东杰《华夏边缘与“现代性”:一九二九年的西番调查》,《读书》2005年第6期。

参考文献:

- [1]牙含章. 达赖喇嘛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周开庆. 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M]. 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
- [3]吴丰培(辑). 民元藏事电稿[G].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4]孙震. 八十年国事川事见闻录[G]. 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9.
- [5]陈启图. 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G]//赵心思,秦和平(编). 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 [6]四川省档案馆(编). 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G].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 [7]莫明(编). 民国藏事档案类编[G]//张羽新,张双志(编纂). 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八册.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 [8]李白虹. 二十年来之川阎战争[M]//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编). 四川内战详记.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9]任乃强. 西康图经·境域篇[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 [10]刘禹九. 拟设筹边处经营边藏策略[G]//赵心思,秦和平(编). 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 [11]朱增望. 川边政屑[G]//赵心思,秦和平,王川(编).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 成都:巴蜀书社,2006.
- [12]吕国璋. 道孚公牍[G]//赵心思,秦和平,王川(编).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 成都:巴蜀书社,2006.

An Overview of the Governing over Sichuan Bordering Area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UANG Tian-hua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ing over Sichuan bordering areas, the Peking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bordering areas between Sichuan and Tibet, successively set up Sichuan Bordering Military Commissioner, Sichuan Bordering Defense Commissioner, Xikang Administration and so on, and moreover, designated the Sichuan bordering areas as special regions. The local authority also took some measures and achieved something. But because of the unrest of Sichuan bordering areas, the declining of Peking Government, the last chaos in Sichuan's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so on, the governing over Sichuan bordering areas had not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chuan bordering areas as special regions; Yin Changheng; Sichuan Bordering Military Commissioner; Sichuan Bordering Defense Commissioner; Xikang Administra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